

主编  
沈志华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第一卷

1945.1—1949.2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主編  
沈志華

# 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

## 中英關係



中國出版集團 東方出版中心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沈志华

副主编 李丹慧 牛 军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宪良 崔海智 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 李丹慧 刘 洋  
娜丝佳(Anastasiya Bayok) 牛 军 沈志华

译校者 (以姓氏拼音为序)

白 桦	曹介民	曹 盟	陈春华	陈宪良	陈云卿	崔海智
戴怀亮	邓 莹	丁宝源	丁 明	樊家鼎	方 琼	冯 峥
高增训	耿葆贞	巩丽娜	古继坤	顾镜清	蒋华杰	李丹慧
李木兰	李 肃	李晓亮	李亚男	李娅妮	李永庆	李越常
刘令仪	刘名子	刘淑春	刘 洋	刘志青	刘仲亨	卢 睿
吕雪峰	吕允连	马善平	娜丝佳	牛 军	彭兴中	强正德
沈凌云	沈志华	师建军	宋 雪	邵浴日	唐松波	王宏达
王会朋	王 前	王 洋	王谊民	王英杰	吴安迪	肖 瑜
谢载福	徐晓村	严巧丽	杨世招	杨希钺	游 览	张好雨
张 坚	张建民	张健荣	张玲玲	张倩茹	张颂超	张秀钰
章若男	赵国顺	甄佳伟	钟舞春	周绍珩	朱丽云	

## 出版前言

本档案集是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俄国中苏关系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DLS002)的研究成果,首席专家是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该课题已于2013年3月提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结项,专家鉴定意见为“优秀”。

收入本档案集的俄罗斯解密档案共有主文件2262件,列为附件的有363件,总计2625件。实际上,有关俄罗斯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是从1995年开始的,至今历时近20年。收入档案集的文件,是从我们收集并整理的4000多件涉及中国问题的俄罗斯档案中挑选出来,并译成中文的。

这些档案文件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这段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1945年至1949年,即抗日战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国共双方对战后相互关系的设想和构建,反映了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中,苏联的对华政策及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二)1949年至1957年,即中苏两党、两国结成紧密同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中苏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密切合作——苏联为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提供了巨大援助,而中共则在政治上给予苏共支持和帮助。(三)1958年至1979年,即中苏从两党分歧走向同盟破裂并最终导致两国严重对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中苏矛盾何以产生,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论战,以及中苏双方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四)1980年至1991年,即中苏关系从紧张趋向缓和,最终走向正常化并因苏联解体而完结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过程以及苏美中三角关系的演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档案解密期的限制,第四阶段即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的文件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国际关系史上,中苏关系不仅十分重要,也具有一些特殊性:一是中苏两国关系同中共、苏共两党关系密不可分;二是冷战前期,两国存在着紧密的同盟关系,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和亚洲最重要的国家。这使得这套档案的内容不仅涉及两国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而且大量涉及两国特别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双方的文化交流问题,等等。由于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地位,中苏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中苏两国与朝鲜、越南和蒙古这三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中,美国始终是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套档案也有不少反映中美关系、苏美关系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变动的内容。此外,印度既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成员和苏联竭力争取的对象,因此档案中也有不少反映中印关系的内容。

文件的形式包括：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及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信函、照会；中苏两国领导人、外交人员及互访人员之间的会谈记录和谈话纪要等；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和会议报告；苏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决议、指令、通知等；苏联驻华大使馆及外交部、安全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和访华代表团呈送上级或党政领导机构的报告、请示、情报、通报等；苏共中央与东欧各国及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共产党有关部门之间的会谈记录、会议记录；苏联政府或苏共领导人与外国政府或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记录和纪要；等等。

所有档案统一按照文件形成的时间排序，分为12卷，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1945年1月至1949年2月）：抗战结束前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国共美苏四角关系、外蒙古独立问题、国共谈判、东北问题、国共停战问题、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内战、美苏关于中国形势的讨论、苏联在东北地区对中共的援助、美国对华政策、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东北军管后各国领事馆问题等。

第二卷（1949年3月至1950年7月）：中国革命形势、苏联对华援助、中共与美国的接触、中国新政府筹备、中苏建交、新政府机构设置、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湾问题、中苏友好往来、毛泽东访苏、中朝关系、中蒙关系、中苏条约谈判、应对朝鲜战争爆发等。

第三卷（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朝鲜战争、中朝关系、中蒙关系、苏联对华援助等。

第四卷（1951年9月至1954年1月）：朝鲜战争、对日和约问题、朝鲜停战谈判、中苏关于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的谈判、“一五”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中苏两党通报各自内部情况、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问题、缅甸共产党实行土改等情况。

第五卷（1954年2月至1955年7月）：高饶事件、日内瓦会议、制定1954年宪法、中苏贸易和苏联援华、胡风问题、第一次台海危机、万隆会议、筹备中共八大、留学生工作等。

第六卷（1955年8月至1956年9月）：苏联援建长江大桥、苏联参与修筑新疆铁路、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技术、苏共二十大、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西藏民主改革、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中朝关系等。

第七卷（1956年10月至1958年3月）：波匈事件、中苏朝三角关系、“双百”方针、中共整风与知识分子问题、苏共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事件、中越关系、莫斯科会议、中蒙边界谈判、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关于台湾问题的情报、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等。

第八卷（1958年4月至1959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七大、苏南关系、中东局势、经互会和华约情况通报、中日关系通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和建设海军、赫鲁晓夫两次访华、华沙大使级会谈通报、中蒙关系和中朝关系、苏联援华问题、西藏问题、中印关系、美苏关系通报、中苏科技合作、中国援助蒙古和朝鲜等。

第九卷（1959年10月至1962年12月）：中印关系、中印边界冲突、布加勒斯特会议、中朝苏三角关系、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中苏经济关系、中苏边界纠纷、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关系、

中国经济困难、苏联对华援助、1960年莫斯科会议、各国共产党对中苏分歧的反应等。

第十卷(1963年1月至1964年11月):中苏分歧加剧、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苏两党论战、各国共产党对论战的反应、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访苏、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等。

第十一卷(1964年12月至1969年6月):印度尼西亚政变、第二次亚非会议、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争端、中朝关系恶化、苏共二十三大、国际共运问题、支援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文革”初期的中苏外交、中国“文革”情况、柬埔寨问题、中苏边界冲突等。

第十二卷(1969年7月至1991年12月):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调查与分析、中苏边界冲突、中美苏三角关系、印度支那和结束越战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文革”后中国的形势和外交政策、澳门问题、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延长《中苏同盟条约》问题、苏共中央关于对华政策的讨论、中苏会谈、苏联事变后的中苏关系走向等。

关于本档案集的整理和编辑工作,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 一、档案出处

本档案集所收入的文件主要出自以下俄罗斯档案馆: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ЦХСД(TsKhSD),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原中央党务档案馆(主要收藏1952年以后的文件),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

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 РГАНИ(RGANI),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РГАЭ(RGAE),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Экономик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РГАСПИ(RGASPI),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 АРАН(ARAN),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АВПРФ(AVPRF),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原苏联外交部档案馆;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 ЦАМО РФ(TsAMORF),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档案馆, АНБРФ(ANBRF), Архи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ГАРФ(GARF),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АПРФ(APRF), 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 РЦХИДНИ(RTsKhIDNI),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原苏共中央档案馆(主要收藏1952年以前的文件),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 ГАХК(ГАКХ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中央档案馆, ЦГАРК(TsGARK),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中央档案馆, ЦГАКР(TsGAKR),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 二、档案收集

这些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实际上是从1995年开始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跟踪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开放和公布的进程,并注意从各种渠道收集有关的解密文件。其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直接在俄罗斯档案馆复制(主要是复印,也有少量手抄)的档案,这包括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等。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我们得到俄罗斯档案的主要渠道。

2. 在收集俄罗斯档案方面,美国学术机构是领先的,它们投入重金大量复制并收藏俄罗斯档案,其中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相关档案的收藏,主要集中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哈佛大学拉蒙特图书馆(Harvard University, Lamont Library)。在我们收集档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俄国档案的开放政策收缩以后,这些学术机构收藏的纸质文件和缩微胶卷就成为重要的来源。此外,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Slavic-Eurasian Research Center of Hokkaido University)、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也收藏了一批相关的俄罗斯档案。

3. 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对其档案馆的管制愈加严格和保守,使用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已经很难在那里寻找和复制文件。所幸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学术机构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各种专题的档案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主要有(以出版时间为序):

*Вартанов В. Н.* Война в Корее 1950 - 1953 гг. :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7(关于1950—1953年在朝鲜的战争:文献资料);

*Волков В. К.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1998(苏联与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文件集);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 – 1952,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9 (中国命运中的苏联与斯大林, 文件与当事人的见证);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 – 1945 гг., Книга 1: 1937 – 1944 гг.; Книга 2: 1945 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20 世纪俄中关系史: 文献与资料, 第四卷);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草稿, 1954—1964 年, 第一卷);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 – 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1: 1946 – 1948 гг., Книга 2: 1949 – 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20 世纪俄中关系史: 文献与资料, 第五卷);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 Том 2,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 – 1958,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1954—1958 年);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1964.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7 (赫鲁晓夫, 1964 年: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献);

Стаф Т. А.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разрядки 1969 – 1976,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1, 1969 – май 1972, Книга 2, январь-май 1972,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7 (缓和年代的苏美关系, 第一卷);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 Том 3.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9 – 1964,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1959 – 1964 年);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д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 – 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1, Взгляд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9 (50 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件集, 第一卷);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д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 – 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2, Друг с союзник нового Кита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0 (50 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件集, 第二卷)。

此外,在俄罗斯学术刊物中也发表了大量的专题档案文献,其中不少涉及中苏关系。这主要是《史料》(Источник)、《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等。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冷战国际史的权威刊物,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P Bulletin)及网站也公布了大量译成英文的俄罗斯原始档案。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出版物及网站已经成为我们收集俄罗斯档案的主要渠道。

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收集俄罗斯档案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学者和朋友的帮助,尤其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把自己收藏的俄罗斯档案毫无保留地提供我们,如中国大陆学者李静杰,中国台湾学者余敏玲,俄罗斯学者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A. Radchenko)、谢尔盖·贡恰罗夫(Sergei N. Goncharov),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马意莉(Elizabeth McGuire)、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加拿大学者吕德量(Lorenz M. Luthi),日本学者下斗米伸夫(Nobuo Shimotomai),匈牙利学者王俊义(Peter Vamos),塞尔维亚学者周万(Jovan Cavoski),以及旅美华人学者刘晓东等。

### 三、编辑体例

#### 1. 文件编号

每个主文件前面都标有编号(No),这是在收集档案时的随机编号,以便于在翻译和编辑时查找档案原文,而与档案的编排顺序无关。

#### 2. 文件标题

每个主文件的标题都是编者根据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编写的,其原则是通过标题即可了解该档案的大意。

#### 3. 文件日期

每个主文件的日期都是编者根据档案内容确定的,其原则是以文件产生的时间为准,如会议的召开、决议的做出、函电(指令、通知)的发出、报告的提交(或完成)等。对于无法确定的日期,则根据具体内容确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

#### 4. 人名翻译

外国人名翻译,主要依据以下工具书:辛华编《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新华通讯社编《苏联人物资料》(1972年)、《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的人名(主要是朝鲜、越南、泰国、印尼等国的人名),按照音译。

中国人名的翻译,音译后对照以下工具书进行确定: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刘继增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名人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5、6卷及附卷1—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或无法确定的人名,按照音译,并在译稿正文中保留原文。

所有档案中出现的人名,均作为附录列入人名译名对照表,以便读者核查。

#### 5. 地名翻译

地名的翻译,主要依据《苏联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俄汉世界地名译

名手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俄汉地名形容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且无法确认的地名,按照音译处理,并在译稿正文中保留原文。

## 6. 注释

在原始档案(主要是专题报告)中含有少量注释,均移入正文相应位置的括号中。

出版物中发表的档案,原编者加有不少注释,我们根据需要保留了其中部分内容,在注释中以“原注”标示。

译者所加注释标示为“译注”,主要用于说明翻译的情况。

本档案集编辑时所加的注释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对原文和译文处理的说明,一类用于对人物、事件或专有名词的必要解释,均标示为“编注”。

## 7. 批注

档案文献中有大量的手写批注,了解其内容可以知道该文件处理的结果,从而进一步了解苏联领导人或相关机构的倾向性意见。可惜的是,批注意见都是手写的,大多数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我们尽可能地把批注的内容翻译出来,以“手写批注”的方式置于文件末尾。

## 8. 文件出处

所有文件最后都标有出处,但情况有所不同。多数文件标示的是原始档案的馆藏号,但也有些文件的馆藏号缺失,其原因:一是在收集档案的初期缺乏经验,没有专门复印或抄录馆藏号;一是俄罗斯或美国出版物公布该档案时未附馆藏号。对于前者,我们将所有收集来的原始档案散件(包括部分出版物公布的档案)均按照时间和专题进行了整理,并已编印成册,即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22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17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26卷),故其文件出处标示的是这些复印件汇编的卷次和页码。对于后者,则标示的是原出版物的刊号和页码。此外,还有少数从网站下载的档案,其文件出处标示的是公布该档案的网址。总之,这里刊出的档案译文,无论是否附有原始档案馆藏号,都标明了其出处,都是有据可查的。所有这些档案的俄文复制件,现存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免费对外开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刊出的档案文件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庞杂,且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虽经两次校对及统稿编辑,但在翻译和编排方面,肯定仍存在不少舛误和缺陷。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些文件能够为相关教学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也要指出,如果在研究中需要引用这些文件,请务必核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

2014年5月

# 序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罗斯档案利用

沈志华

中苏关系的历史,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政治学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尤其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直到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处于冷战或受其影响的状态中。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从世界政治格局或国际关系形态看,冷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包含着两次重大变化,或可称之为“转型”。总的说来,1947年春夏至1949年底是冷战的初期,其范围限于欧洲,而内容则是以美苏之间的对抗为核心;1950年初至60年代末是冷战的中期,其范围扩展到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而资本主义阵营则构造了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包围圈,同时,双方争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角力也开始升温;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是冷战的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国退出原来意义上的冷战,而美苏争夺则在缓和对话与军备竞赛中愈演愈烈,最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稍微仔细地观察便可发现,冷战的这两次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第一次转型是由于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同盟形成并联手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第二次转型则在于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两国领导人决心分道扬镳。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国际格局或形态,冷战的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是同步的,中苏同盟的兴衰是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现象之一,而中苏同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冷战的结局。原因在于,中苏关系是战后整个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冷战时期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这一现象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中苏同盟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破裂的?看似强大而牢固的中苏同盟为何只存在了短短几年?昨天还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国怎会突然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冷战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方式结束,还引起人们对另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苏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兴起以后,首先是一系列东欧国家和亚洲的蒙古、朝鲜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中国和越南、古巴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主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这些国家都仿照苏联模式确定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分化的结果,导致阵营内部各国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1948年,南斯拉夫第一个被苏联革除“教门”,走上了对内实现工人自

治、对外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独立发展道路。1956年的波匈事件表明了东欧诸国对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苏联道路的怀疑和反叛。1960年代中期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宣布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后，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而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则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剧变，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实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最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自身也仿效东欧各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中苏关系的破裂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回答同盟理论的问题，还是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回答发展道路的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历史事实。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表明，人们过去对中苏关系史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和舛误。

中苏同盟形成、发展和破裂的历史过程，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早在1960年代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开始对此著书立说。<sup>①</sup>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地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研究成果不胜枚举。<sup>②</sup>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先天性缺陷。从苏联和中国方面来说，学术性研究还根本谈不上，即使有个别著作出现，囿于意识形态的偏向，也不过是相互指责对方，为己方的政策辩护而已。<sup>③</sup>至于西方学者，其局限性则在于看不到相关的档案文献。对于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研究者只能依据报纸杂志上的公开资料去推理和猜测。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文献长期封存，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根本无法为一般学者所利用，这是阻碍历史研究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及至1991年冷战结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一现象曾被认为是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革命”，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sup>④</sup>不过，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俄罗斯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罗斯档案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的俄罗斯档案主要有三个来源。

① 例如：R. L. 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London, 1966; C. J. Zablocki(ed.), *Sino-Soviet Rivalry: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New York, 1966; R. A. Rupen and R. Farrell(eds.), *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1967; M. Halperin(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Cambridge, 1967; W. C. Jr. Clemens, *The 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Stanford, 1968.

② 只要在稍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询 Sino-Soviet 一词，出现的相关论著就会令人目不暇接。

③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共中央两位官员的化名著作：Борисов О. Б., Колосков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80。中译本见：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鲍里索夫即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 О. Б. 罗满宁，科洛斯科夫则是苏共中央国际部处长 Б. Т. 库利克。

④ 关于俄罗斯档案的开放和利用的情况介绍，参见 Mark Kramer, “Archival Research in Moscow: Progress and Pitfall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 Issue 3, Fall 1993, pp. 18—39; 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36—149页；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第140期（2000年），第200—217页。

第一,俄罗斯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这些档案文件多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备忘录、电报及相关机构的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46—1948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函电<sup>①</sup>,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和谈的往来电报<sup>②</sup>,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的报告<sup>③</sup>,有关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文件<sup>④</sup>,有关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文件<sup>⑤</sup>,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往来电报<sup>⑥</sup>,1951—1957年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sup>⑦</sup>,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sup>⑧</sup>,以及1962—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时的有关文件<sup>⑨</sup>。这批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公布者的主观色彩。如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利用其在俄罗斯的特殊地位,经常在各种刊物披露经他本人挑选的档案,同时发表自己对这些文件的解读。这种挑选和解读往往表现了披露者个人的主观意识,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sup>⑩</sup>不过,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sup>⑪</sup>,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

-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прежнему остается сложным, Письм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 В. Сталину, 1946 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4, с. 4 - 13;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с И. 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6, с. 117 - 122;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Еще раз о телеграмм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 В. Сталину от 30 ноября 1947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1, №5, с. 119 - 122.
- ②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4 - 5, с. 132 - 140.
- ③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 96 - 111; №3, с. 94 - 105.
- ④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 №4, с. 66 - 83; №5, с. 84 - 94.
- ⑤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 — феврале 1950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1, с. 23 - 47;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12 советов И. В. Сталина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1, с. 125 - 131.
- ⑥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 - 1953 годов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 79 - 113.
- ⑦ Бухерт В. Г. П. Ф. Ю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докладные записки И. В. Сталину и Н. С. Хрущеву, 1951 - 1957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4, с. 14 - 28; Григорьев А., Зазерская Т.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 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01 - 111.
- ⑧ Зубок В.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 - 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1, 100 - 128; №2, с. 94 - 106.
- ⑨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Ваше письмо зовет к сплочению — и это хорошо. Из служебного дневника посла СССР в КНР С. В. Червоненко, 1960 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5, с. 3 - 11; Прокуменищikov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Неувавшаяся попытк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ия, 1964 - 1965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5, с. 12 - 27; 2007, №1, с. 3 - 24.
- ⑩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第二章第三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 ⑪ 例如,列多夫斯基关于米高扬秘密访华的文章发表后,因米高扬在报告中说中共曾提出掌握政权后将把民主党派赶下政治舞台的说法,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便有人撰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见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详见《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在俄罗斯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罗斯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有些内容涉及中苏关系,如有关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文件<sup>①</sup>;有些本身就是以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为主题的。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第四卷第二册,2004年又编辑出版了第五卷(分两册),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sup>②</sup>其中有关中苏领导人接触的50份最新文件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sup>③</sup>此外,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2002年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sup>④</sup>,2007年出版了1964年苏共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及其他文献<sup>⑤</sup>,2003—2008年分三卷出版了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sup>⑥</sup>,其中有不少文件是有关中国或中共问题的。显然,这些档案对于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最后,2009年和2010年,远东所又编辑出版了两卷文献集《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是涉及中苏关系的苏联文件资料。<sup>⑦</sup>

第三,俄罗斯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罗斯历史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此外,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 Stanford University)也收藏了大量俄罗斯档案。笔者1993年放弃生意、返回学界时,听到俄罗斯档案开放的消息,便倡议中国的历史研究者,特别是苏联史研究者,立即着手收集俄罗斯档案。

①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Волков В. К.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值得提到的是,利用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的文件编辑的《季米特洛夫日记》,也有许多涉及中国和中共问题的重要资料。见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 1933 - 6 феввари 1949), София: Универстетско издаделство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1997.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Мирвицкая Р. А.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 - 1945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Мирвицкая Р. А.,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 - февраль 1950, К. 1: 1946 - 1948гг.; К. 2: 1949 - февраль 1950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③ *CWIP Bulletin*, Issues 16, Winter 2007/2008, pp. 113 - 177.

④ Хлевнюк О. В., Горлицкий Й. Докумен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 - 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直到1952年10月十九大召开前,苏共的正式名称应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为叙述方便,本书在一般情况下都使用“苏共”一词。

⑤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1964.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7.

⑥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Том 2,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 - 1958,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6; Том 3.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9 - 1964,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8.

⑦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д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 - 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1, Взгляд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 т. 2, Друг с союзник нового Кита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9, 201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王忍之的支持下,笔者与李丹慧、闻一、薛衔天、杨建国等中国学者曾数次自费前往俄罗斯和美国,专程收集俄罗斯解密档案。由于俄罗斯在档案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固有弊端,以及相关政策变幻莫测,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利用时松时紧,所以在那里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把握机会极为不易。

从档案收集的结果和国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情况看,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文件主要收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sup>①</sup>、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sup>②</sup>、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sup>③</sup>、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sup>④</sup>、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Экономики)、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件虽然显得分散凌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在此基础上,笔者带领手下博士生已将这些档案的原文复印件按照专题整理成册,以便中国学者利用。<sup>⑤</sup>其中,一些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文件已经译成中文在各专业杂志上陆续发表。<sup>⑥</sup>

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冷战史领域研究的热点。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东方历史学会的前身)、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6个国家的近30名学者。会议上,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打开了冷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的历程。会后,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在这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分别以英文和中文出

①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

② 原苏联外交部档案馆。

③ 原中央党务档案馆,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④ 原苏共中央档案馆,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⑤ 其中包括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22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17卷)、《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26卷)。这些原始文件汇编均未出版,现存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

⑥ 如《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世界历史年刊》1997年号;《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会谈)》,《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条约)》,《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7辑(1998年9月);《〈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期;《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2002年5月);《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1953—1959)》,《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3年);《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最后阶段的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

版了两部论文集，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sup>①</sup>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成立后，特别关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并于2007年和2009年再次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合作，先后召开了两次专题国际研讨会。这两次会议都集中了世界各国研究中苏关系史前沿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并充分利用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文献，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sup>②</sup>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学者充分利用俄国解密档案考察中苏关系的专著也陆续问世。

在俄罗斯，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苏共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以往苏联政策进行辩护的。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sup>③</sup>在专题性著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中苏边界问题<sup>④</sup>，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sup>⑤</sup>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不过总体看来，俄罗斯本身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是老一辈学者在支撑，很少看到有青年学者跟进，故颇有青黄不接之虞。

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过程的讨论，最为详尽地使用了俄罗斯解密档案。<sup>⑥</sup>美国学者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所使用的主要也是俄罗斯档案。<sup>⑦</sup>几年前，以英文出版了两部充分利用俄罗斯档案、集中讨论中苏关系的专著，很有学术分量，即丹麦学者吕德量（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和俄罗斯学者拉琴科（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的《天有二日：中苏对领导权的争夺》，这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其原因。<sup>⑧</sup>此外，笔者还看到两部很有

① Odd Arne Westad(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 - 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这两次讨论中苏关系历史的会议均有论文集，一本正在编辑中，一本已经出版了中文本，见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③ 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 - 1952, Москва: НИМ РАН, 1999;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Рахманин О. Б. К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XX веке, Обзор и анализ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2.

④ 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 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 Владивосток: Уссури, 1999;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Попов И.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300 лет на грани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Рябушкин Д. С. Мифы Даман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Ивасита А. 4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проблем: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ниц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6.

⑤ Бармин В. А.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 - 1949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 - 1960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ИИХ СПбГУ, 2000; Мартыненко В. П. (ре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связи: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5.

⑥ 原文为德文，中译本见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⑦ 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⑧ Lorenz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 - 1967*, Washington D. C. & Stanfor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意思的未刊英文书稿,其作者都是美国的年轻学者。马慧莉通过发掘有关中国早期革命的俄罗斯档案,广泛利用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对伊万诺娃国际儿童院的实地考察,讲述了中共领导人及其子女在苏联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从而对中国革命如何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李滨则利用大量俄罗斯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档案材料,讨论了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sup>①</sup>

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且成为他们研究中苏关系的主要史料来源。除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外,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有薛衔天的《中苏关系史(1945—1949)》,沈志华、李丹慧的《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以及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牛军合著的《中苏关系史纲》。<sup>②</sup>此外,还有一些涉及科学技术、教育、经济、苏联专家和朝鲜战争的专题性研究著作。<sup>③</sup>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苏关系史乃至整个冷战国际史研究至今取得的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1990年代初开始的那场“档案革命”,其次才是学者的努力。为了推动中国学界有关中苏关系史以及国际共运史、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笔者与李丹慧、牛军提出了收集、整理和翻译相关俄罗斯解密档案的课题,并于2009年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作为上海市的重大课题立项。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课题组对收集到的4000多件涉及中国问题的俄罗斯解密档案进行了整理,主要是确定文件的时间及相互间的从属关系,然后挑出其中2500多个文件(含附件)组织了中文翻译。考虑到在中国已有研究机构正在从事涉及1945年以前中苏关系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我们所选文件的时间跨度确定为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至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从内容上讲,则主要是挑选那些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档案。

这批以中文形式出版的俄罗斯档案文献,对中国学界的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中苏关系史、冷战国际史乃至当代中国史,无疑将产生重大的推动和影响。实际上,作为课题组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我们在组织整理和翻译这批档案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开始了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牛军完成了《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写作,笔者完成了《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写作,李丹慧则即将完

① Elizabeth McGuire, *The Sino-Soviet Romance: How Chinese Communists Fell in Love With Russia, Russians,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0; Douglas Stiffler, *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7*.

②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③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2000年版;《苏联专家在中国》(修订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